



東台灣叢刊之八

國家、區域與族群

臺灣後山奇萊地區原住民族群的歷史變遷
(1874-1945)

潘繼道 著

東台灣叢刊之八

國家、區域與族群—
臺灣後山奇萊地區原住民族群的歷史變遷
(1874—1945)

潘繼道 著

中華民國九十七年二月二十九日

東台灣研究會

自序

潘繼道

從碩士論文到博士論文，筆者都是以臺灣後山的原住民族群作為研究的對象，是因為傳統的歷史教育中，學生們熟悉了中國朝代的歷史演變，卻對自己生長的鄉土感到陌生，有種疏離感；瞭解了漢人的拓殖經驗及豐功偉業，卻不知道原住民族群亦有披荊斬棘的一面；加上過去以後山，尤其是花蓮地區為探討主題所做的歷史學術研究並不多，且多偏向以漢人為中心的歷史，或以日治時期的產業發展作為研究的主題，對原住民族群的著墨不多，甚至帶有偏見。

筆者出生於多族群分佈的花蓮縣，在就讀臺中東海大學之前，都一直待在花蓮求學，受這塊土地的孕育，「生於斯，長於斯，也希望將所學奉獻於斯」。加上筆者曾祖母為西拉雅平埔族（Siraya），身上或多或少流著原住民族的血液，因此，對這些無文字傳統的族群，深覺有責任為他們保存歷史。

本書乃筆者在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就讀博士班時，所撰寫的「國家、區域與族群—臺灣後山奇萊地區原住民族群歷史變遷之研究（1874—1945）」學位論文，經修改而出版的著作。筆者希望透過這個研究，使大家思考國家力量對臺灣後山奇萊地區原住民族群所造成的歷史變遷，並進而充實奇萊地區歷史的空白。

本書的完成，最要感謝的是博士論文的指導教授 溫振華老師。在過去從事田野調查、博士論文撰寫時，吾師經常給予最大的指導、啟發與包容，使筆者在撰寫時，有最大的探索空間。同時，也一直叮嚀要注意後山奇萊地區原住民族群，在當時及長期的時空發展下，與周遭區域族群之間的互動關係，及其部落、臺灣島內與島外活動等經驗的發展。

接著，要感謝博士學位論文口試時提供修正意見的林修澈老師、戴寶村老師、鄭瑞明老師、吳學明老師。其中，戴寶村老師是筆者在東海大學碩士論文的指導教授，從過去以來一直給予筆者指導及鼓勵，同時期勉筆者繼續研究，在此致上深深的謝意。

而在學位論文送交東臺灣研究會編輯委員審查的過程中，兩位匿名審查人所提供的寶貴修改意見，給予筆者非常大的幫助，在此也致上謝忱。當然，提供機會並獎助出版的東臺灣研究會、曹永和文教基金會，是筆者最要衷心道謝的。

王啟宗老師、李國祁老師、吳文星老師、廖隆盛老師、林滿紅老師、鄧世安老師及王美芳等諸位助教，於筆者博士班課程學習時，所給予的指導、鼓勵與協助，是筆者成長的最大動力，在此一併銘謝！

另外，要感謝接受筆者叨擾，提供寶貴口述歷史及參考意見的各族耆老與先進，包括花蓮的考古暨鄉土教育專家王天送先生、李來旺校長、楊南郡老師、孫月眉主任、詹燕清先生、偕得福夫婦、偕萬來先生、江加走夫婦、潘東先生、黃金文先生、田貴實先生等人，由於有他們的協助，使本書的內容更加豐富。

論文撰寫期間，博士班的摯友蔡龍保、中研院臺史所的詹素娟老師及在政大民族學系攻讀博士學位的好友李宜憲，協助筆者影印資料及提供相關參考書籍；學長許毓良於系上論文發表會時，提供參考意見；昔日在花蓮四維高中任教時的學生鐘婉毓，協助《臺灣日日新報》、日文書籍等照片檔案的整理；國家圖書館、臺灣分館、臺灣文獻館等機構的先生、小姐們，於筆者找尋書籍、日治時期總督府公文、相關資料時給予最大的方便與幫助，在此深深地感謝。而系上共同學習的同學、學長姊、學弟妹的鼓勵，及課程學習中的相互提攜，更是筆者所無法忘懷的。

最後，要感謝內人郁清與家人的鼓勵與協助。內人在筆者就讀博士班期間，完全負擔家中的經濟重擔，使筆者能專心完成學

業，是筆者最強有力的支柱。因為有她的鼓勵，始能使博士論文及數篇關於花蓮原住民族群、歷史的相關論文得以完成。而內弟黃信元於本書出版前，協助英文書名與摘要的校訂，使本書得以藉由不同的語文介紹，合乎現行的出版習慣。

篇幅有限，要感謝的人實在太多，如果不小心遺漏了，還盼請見諒，並致上我最高的謝意。

未來筆者仍將秉持著對歷史及鄉土的熱愛，為後山、花蓮歷史的還原奉獻心力。

2008年1月於花蓮教育大學鄉土文化學系

目 次

緒論	
第一章 奇萊地區的自然環境與原住民族群	27
第一節 「奇萊」的界定與自然環境	27
第二節 奇萊地區的原住民族群	34
第二章 清帝國統治的建立	57
第一節 國家統治機構的建立	57
第二節 初接觸清帝國的奇萊地區原住民族群	70
第三章 「加禮宛社之役」與奇萊地區原住民族群勢力之消長	79
第一節 戰事的爆發與清帝國的善後措施	79
第二節 遷社問題的探討	88
第三節 戰爭後奇萊地區原住民族群勢力之消長	94
第四章 日本帝國統治的建立	103
第一節 日治初期理蕃政策的演變	103
第二節 日治初期奇萊地區的原住民族群概況	120
第五章 日治初期統治當局與奇萊地區原住民族群之互動 (1895-1914)	155
第一節 太魯閣族群的抗日事件與統治當局的對策	155
第二節 「七腳川社之役」的緣起與善後	172
第三節 太、日最後的決戰—「太魯閣之役」的登場	210
第六章 日治中期奇萊地區原住民族群統治政策之推移與影響 (1915-1930)	223
第一節 重要措施與奇萊地區統治威權的完成	223
第二節 平地原住民族群的統治政策與影響	242
第三節 太魯閣族群的統治政策與影響	273
第七章 日治末期統治政策與奇萊地區原住民族群之歷史變遷 (1931-1945)	319
第一節 「霧社事件」後的理蕃政策	320
第二節 「皇民化運動」下奇萊地區的原住民族群	350
第三節 「太平洋戰爭」下奇萊地區的原住民族群	376
第八章 結 論	391
參考書目	401

表 次

表 3-3-1：光緒 20 年加禮宛地區民番戶數、人口數一覽表.....	95
表 3-3-2：光緒 20 年南勢阿美（含歸化社及飽干）戶數、人口數 一覽表.....	98
表 4-2-1：明治 29 年廣瀨充藏調查奇萊地區平地原住民族社戶數 及人數表.....	126
表 4-2-2：明治 29 年 9 月豐田龜萬太調查大鹿角五社正副頭目、 戶口、勇丁人數表.....	130
表 4-2-3：明治 29 年田代安定奇萊地區平地原住民資料統計.....	131
表 4-2-4：明治 30 年 11 月 25 日調查太魯閣蕃資料表.....	136
表 4-2-5：明治 30 年 6 月 25 日調查木瓜蕃資料表.....	137
表 4-2-6：明治 33 年 3 月相良廳長外太魯閣蕃調查表.....	140
表 4-2-7：明治 34 年 5 月齋藤精一記錄蕃社別、戶數及男、 女人員表.....	141
表 5-2-1：明治 41-42 年七腳川社等參與反抗勢力一覽表.....	185
表 5-2-2：明治 42 年歸順七腳川社蕃人移住人數.....	193
表 6-3-1：太魯閣山地的理蕃道路-1.....	275
表 6-3-2：太魯閣山地的理蕃道路-2.....	277
表 6-3-3：太魯閣族群蕃童教育所一覽表.....	286
表 6-3-4：太魯閣族醫療設施一覽表（大正 4-15 年）.....	300
表 6-3-5：太魯閣蕃地的蕃產交易所.....	303
表 6-3-6：太魯閣族集團移住簡表.....	313
表 7-2-1：花蓮港廳神社及社一覽表.....	354

圖 次

圖 4-1：奇萊地區街庄社概況圖.....	132
圖 4-2：木瓜蕃社分佈概況圖.....	133
圖 5-1：奇萊地區隘勇線圖.....	171
圖 5-2：七腳川社附近族社圖（一）.....	173
圖 5-3：七腳川社附近族社圖（二）.....	174
圖 5-4：「七腳川社之役」後隘勇線計畫圖.....	188
圖 5-5：吉野移民村與南勢各社分佈圖.....	204

緒 論

一、研究動機與目的

臺灣後山¹面積遼闊，自古以來即是個多族群分佈的區域，而在今天所謂的「原住民」族群尚未遷徙到後山之前，²此地原本就有非常豐富的史前文化存在，³顯示過去這裡也曾有其他先住民族分佈。這些不同的原住民族群，或許在容貌、文化、習俗、語言上有所差異，但他們共同的特徵，都是沒有文字，且沒有出現、形成國家的組織。

隨著時間的推移，人類歷史進入了「大航海時代」（15世紀末葉開始，舊稱「地理大發現」），由於西方國家的船隻航行經過臺灣東部海岸時，接觸到後山的風土與族群，因而將後山的地名、族社、傳說、珍貴產物（砂金）與景況推向世界史的舞臺，雖然著墨不多，但已使當時後山的部分概況及族群分佈呈現紙上。

由於後山北部河川（立霧溪或花蓮溪口）產金的訊息，使得西班牙人、荷蘭人先後進入後山查探，其中，西班牙人並未在後山正式設治；荷蘭人曾利用「地方集會」來監督、控制部分原住民族社，甚至發動戰爭懲罰不服政令的族社，⁴但整體而言，荷蘭政權對後山地區只是維持象徵性的統治，並未積極開發。⁵1662

¹ 此處所說的「後山」，所指的區域為中央山脈以東，包括今宜蘭縣蘇澳鎮一部分、南澳鄉、花蓮縣、臺東縣及屏東縣獅子鄉一部分、牡丹鄉東部及滿州鄉八瑤灣以北的一部分。

² 在後山，不管是漢人或原住民族群，都非真正的「原住」族群，而是在不同時期因不同的需要，從後山以外的地方遷徙來的。

³ 包括富世、花崗（岡）山、布洛灣、鹽寮、掃叭、公埔、麒麟文化、長濱文化、卑南……等遺址。

⁴ 見康培德，〈殖民接觸與帝國邊陲——花蓮地區原住民十七至十九世紀的歷史變遷〉（板橋：稻鄉出版社，1999），第3-4章。

⁵ 林玉茹，〈國家在東臺灣歷史上的角色〉，收入《東臺灣研究》，期5（2000），頁162。

年，鄭氏王朝趕走了荷蘭人，由於統治的區域在臺灣南部，因而此地的記載模糊了起來，除了仍有採金的傳聞之外，⁶後山族社的名字在歷史的記載中，都消失了蹤影。

過去鄭氏王朝、清帝國及一般漢人，在稱呼臺灣原住民族群時，習慣使用「番」；日本人則改稱為「蕃」。⁷本文為了書寫的流暢，及應對撰寫時空的情境，在行文中對原住民族群的稱呼，仍依當時文獻記載及當局、一般人的稱呼與用字習慣，在日治之前使用「番」字，日治之後用「蕃」字，非有歧視之意，特此聲明。

到了清帝國統治臺灣前期，由於活動範圍仍以西部臺灣為主，後山地區並未正式設治，只有少數冒險家及通事從事零星的探險或番產貿易，後山族社的族群互動或遷徙並不清楚。其間亦有漢人農民前來拓墾，但在瘴癘侵襲及國家統治力量尚未進入之前，成效相當有限，最後甚至在原住民族群的攻擊之下完全放棄。

直到同治 13 年（1874）日軍侵臺的「牡丹社事件」之後，清政府才驚覺「化外之民」、「化外之地」治理的重要，為了宣示對後山的領土主權，乃以兵工分北、中、南三路開鑿番界道路，以便進入後山設施政教、實際統治，以杜絕外國勢力侵佔番地的野心。

當時清帝國的「開山撫番」，基本上是一種「武裝殖民」，除了以軍隊駐防後山之外，更以優渥的條件鼓勵漢人移往後山，

⁶ 黃叔璥，《臺海使槎錄》，臺灣文獻叢刊第 4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7），頁 139-140。

⁷ 李文良在其博士論文的〈例言〉中提到：「清代一般寫作『番』，如生番、化番、熟番、番界、番人、番地；日治時代則因日文已有『番』之漢字，為了避免重複，添加草字頭改作『蕃』，如生蕃、熟蕃、化蕃、蕃界、蕃人、蕃地等等。」（李文良，〈帝國的山林—日治時期臺灣山林政策史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2001），〈例言〉）。其中的「為了避免重複」，改成「避免混淆」，或許會合適一些。

並保護漢人移民的安全。由於國家力量正式進入後山，使原住民族群的生活空間受到侵擾，因而引發不悅。其間曾有數次因原住民族社的反抗而進行征討，也曾「以番制番」來平定番亂，⁸但由於清廷的「開山撫番」，是因應外來入侵者所做的回應，因而在經營上並不積極，後山不過是帝國的邊陲，只要原住民族群不挑戰統治權威，或引起外國勢力的覬覦，他們仍可依循傳統的行為法則，與周遭的族群互動。

而在清帝國對後山原住民族群的控制方面，對平地的控制力相對地比對中央山地的族群來得強：反抗的平地原住民族群於戰敗之後，遭遷徙或滅社的命運；山地的原住民族群則依然馳騁在山林之間，絲毫未受到衝擊。

從前原住民族群的社會中，「社」的概念比較強，並沒有「族」的概念；同族間的各社可能發生征戰，而異族的鄰近番社卻可能是攻守同盟的朋友。但自明治 29 年（1896）日本帝國進入後山統治之後，整個情況有了相當大的改變。

由於這個時期國家力量積極地介入，即使臺灣山地居住著強悍的原住民族群，但卻有豐富的自然資源（樟腦、森林、礦產），為了統治威權的確立、臺灣治安的考量，及殖民地經濟的自主，山地的開發成為必要的政策，而如何「理蕃」（理番），就考驗了日本統治者的智慧。為了有效統治，並積極開發資源，政策的擬定就變得非常重要，至此，後山原住民族群的發展史，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命運也發生空前的改變。而在日本學者進行族群研究歸類，以及數次大規模的征討之下，「同族」⁹的概念被強化了起來。

⁸ 其中，最明顯曾用「以番制番」方式對付番亂的，包括阿棉納納事件（1877）、加禮宛社之役（1878）、大庄之役（1888）等。

⁹ 關於這樣的論點，不只是筆者有而已，孫大川也曾提及類似的觀點：「臺灣原住民認同邊界的浮動，結構性的改變應當是一八九五年日據時代開始。作為已

過去筆者在從事碩士論文寫作，及撰寫多篇關於後山原住民族群歷史研究的短文時，發現族群之間的互動相當頻繁，如果只選擇某一支族群來探究，勢必造成遺漏或偏見；但如果拿整個後山來作為探討的課題，則範圍似乎又太過於龐大，因此，將之縮小為以「奇萊」地區做為研究的空間範圍，探究在不同時期，國家統治政策介入與不介入，積極與消極之間，對奇萊地區的原住民族群有何影響？而族群勢力的消長，對後山族群的分佈及變遷，又扮演了何種角色？

所謂的「奇萊」，筆者是以日治時期學者所界定的範圍：北到新城，南到吳全城，東到海，西到山為界。由於族群互動的頻繁，也會將鄰近的區域一併加以探討，以使研究空間的整體性不致被分割。

為何要選定「奇萊」這個區域作為研究的範圍呢？因為本區域從「大航海時代」以來，即有非常豐富的族群互動，甚至遷徙，而且有不同的外國勢力、政權在此地進行勘查、經營。清道光年間，臺灣東北部噶瑪蘭平原（蘭陽平原）的噶瑪蘭平埔族（Kavalan）遷來後山之後，即居住在奇萊地區的北部，他們為了族群的生存，必須結合奇萊平原中心的強大族社撒奇萊雅族（Sakizaya、Sakiraya，撒基拉雅族、奇萊族）共同面對近山地區太魯閣族（Toroko、Taroko、Dalugu 或 Truku）的威脅，二者更曾共同出兵驅趕太魯閣族人，甚至使加灣（今秀林鄉景美村）一帶的太魯閣族人恐懼；但同光之際「開山撫番」之後，噶瑪蘭族人因駐守清

完成現代化的有效殖民政府，日本改造臺灣原住民『民族性』，是相當有效率的。經過田野調查的知識積累，日本政府成功地完成了全臺灣原住民的族群識別和分族命名的工作，使原住民從原來的部落認同，逐漸轉化成更集體化的族群意識。部落意識的消弱，使原住民各族得以超越部落疆界，形成比較明確的『族類感』；『族名』的確立，也使原住民之『我族』與『他族』的界線，能有一『空間』、『地域』之外的新座標」。（孫大川，〈被迫讓渡的身體—高砂義勇隊所反映的意識構造〉，《當代》，期 212（2005），頁 126-127）。

軍行為不檢，及不堪其欺壓，而於光緒 4 年（1878）爆發了「加禮宛社之役」（「加禮宛事件」）。這場戰役除了使噶瑪蘭人及撒奇萊雅人勢力崩解、遭到遷社的命運之外，也造成奇萊地區原住民族群勢力的重整—南勢阿美（Ami）的勢力跨過七腳川溪，七腳川社成為南勢阿美族群中最強的族社；而太魯閣族人一躍成為後山北路最強大的族群。

再者，「開山撫番」之後於後山北、中、南形成三個重要的據點，即花蓮港、璞石閣、卑南覓，其中，花蓮港正是位於奇萊地區。日治初期，花蓮（港）並未成為獨立的行政單位，在不同時期隸屬於臺東支廳、臺東撫墾署、臺東廳等管轄。但在「理蕃」的過程中，由於後山地理形勢南北狹長，而奇萊及其周遭地區原住民族的事務又相當繁雜，更是理蕃初期主要對象的所在，行政中心設在臺東（卑南），實有鞭長莫及之感，且層層命令下達時，總嫌慢了一些，因而在明治 42 年（1909）10 月 25 日〈臺灣總督府地方官官制〉改革時，花蓮地區正式獨立設治，成為「花蓮港廳」，而廳治正是在奇萊地區。而日治前期發生的「新城事件」（1896）、「威里事件」（1906）、「七腳川社之役」（「七腳川事件」）（1908-1909）、「太魯閣之役」（1914）……等，也都以奇萊及其附近地區為主要的戰場。由此可見，奇萊地區在後山發展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值得深入探討。

筆者希望透過研究，使大家思考國家力量對於奇萊地區原住民族群所造成的歷史變遷，並進而充實後山奇萊地區歷史的空白。而探討的時間斷限，乃自晚清「牡丹社事件」到日本統治時期結束（1874-1945），因為這段時期國家力量因應不同的需要而進入奇萊地區，並且設立統治機構，正式治理及征伐、教化原住民族群，藉由這兩個時期國家力量介入及統治的探討，可以比較不同國家勢力進入，對原住民族群所產生的衝擊與歷史變遷。

二、文獻評估與研究回顧

(一) 文獻評估

清帝國時代，在「開山撫番」之前的文獻資料，主要來自於文人、官員的著作、奏摺、書信及地方志，但由於真正進入後山活動的只有少數的商販、探險家，以及為招諭生番而來的通事，因而對奇萊地區的敘述非常少，而且往往來自於傳說，因此，引用資料來分析國家勢力進入前的原住民族群關係與發展時，必須特別的小心。

進入「開山撫番」之後，由於開路及設治，對奇萊地區的敘述多了起來，包括羅大春《臺灣海防並開山日記》、沈葆楨《福建臺灣奏摺》、吳贊誠《吳光祿使閩奏稿選錄》、胡傳《臺東州采訪冊》與《臺灣日記與稟啟》、《申報》、《清穆宗實錄》、《清德宗實錄》、《道咸同光四朝奏議選輯》、《臺灣通志》劉銘傳《劉壯肅公奏議》、馬偕《臺灣六記》、連橫《臺灣通史》……等，雖然記錄不及臺灣西部豐富，但已簡單地勾勒出奇萊地區的自然與人文景象，及清帝國對後山原住民族群的統治政策、番亂發生時的處理方式。

到了日本帝國統治時期，為了殖民統治的順利推展及經濟開發，並豐富日本殖民母國的經濟，乃積極地進行各項調查，因而也留下豐富的資料。而統治的過程及理蕃政策、經過，更是記錄翔實。這個時期的文獻記錄相當多，包括田代安定《臺東殖民地豫察報文》、《花蓮港地方巡視報告》、豐田龜萬太《新城及大鹿角附近巡視報告》（收於《花蓮港地方巡視報告》後半部）、鹿子木小五郎《臺東廳管內視察復命書》、移川子之藏《臺灣高砂族系統所屬の研究》、森丑之助《臺灣蕃族志》、鳥居龍藏《東部臺灣諸蕃に就て》、馬淵東一《研海地方に於ける先住民の話》、

日本臺灣守備第一混成旅團司令部編《臺灣史料》(二)、《臺灣總督府陸軍幕僚歷史草案》、安倍明義《臺灣地名研究》、筒井太郎《東部臺灣案内》、渡邊善嗣《改隸前の東部臺灣》、檜崎冬花《太魯閣蕃討伐誌》、橋本白水《東臺灣》、《東臺灣研究叢書》、《理蕃誌稿》、《總督府公文類纂》、《蕃族調查報告書》、《蕃族慣習調查報告》、《臺灣蕃族慣習研究》、《臺灣日日新報》、《漢文臺灣日日新報》、《臺灣教育沿革志》、《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臺灣警察協會雜誌》、《臺灣警察時報》、《臺灣時報》、《理蕃の友》……等。但有時殖民統治者會將其征討行為合理化解釋，因此，在徵引時必須加以釐清，以便找出較接近真相的答案。

(二) 研究回顧

近人的研究中，直接針對奇萊地區所做的探討不多，有些只佔著作的一小部分。

關於清帝國統治時期，康培德的論著《殖民接觸與帝國邊陲——花蓮地區原住民十七至十九世紀的歷史變遷》中的〈異族建構〉與〈帝國邊陲〉兩章，屬於晚清時期的探討，主要分析南勢阿美在當時的區域分佈與勢力範圍的變遷，¹⁰而有關統治政策以及山地的太魯閣族群的探究方面，則是可以再加以深入分析的。詹素娟的博士論文〈族群歷史與地域——噶瑪蘭人的歷史變遷（從史前到1900年）〉，對噶瑪蘭族的遷移及「開山撫番」後的勢力消長，有不錯的分析。¹¹而張世賢的《晚清的治臺政策（同治十三年至光緒二十一年）》，是在「牡丹社事件」的大環境變遷下，探討晚

¹⁰ 康培德，《殖民接觸與帝國邊陲——花蓮地區原住民十七至十九世紀的歷史變遷》，頁129-219。

¹¹ 詹素娟，〈族群、歷史與地域——噶瑪蘭人的歷史變遷（從史前到1900年）〉（臺北：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1998）。

清的治臺政策，尤其是針對不同主政者的意見及統治手腕有獨到的分析，¹²但是對於原住民族群的反應及勢力消長的部分，則比較欠缺深入的探究。

王慧芬的碩士論文〈清代臺灣的番界政策〉，對清代臺灣的番界政策演變有詳細的探討，但就比例上而言，乃以臺灣西部為主。¹³李宜憲的〈晚清後山駐兵初探〉、〈晚清後山駐軍與民庄的關聯性〉、〈晚清後山開撫議論之流變〉，則是從駐兵區、駐軍與民庄的關係，及開撫思想的轉變，來探討後山的歷史變遷，¹⁴是過去後山研究者較少注意的課題。張永楨的碩士論文〈清季臺灣後山開發之研究〉，對漢人移墾及清帝國的統治著墨較多，並認為南、北二路之開闢，奠定了日後開闢蘇花公路與南迴公路之基礎，而且由於安撫原住民族，使後山成為漢人與原住民族共存共榮之地，奠定了日治時期及光復後經營後山之基礎。¹⁵事實上，這些基礎一直到日治時期才算建立，因為番界道路與日治時期的道路並不相同，而且清末的番界道路由於原住民族群的襲擊，及瘴癘之氣的緣故經常不通，要到日治時期積極的「理蕃」，深入部落的底層，才使得戰後中華民國政府得以順利地進行統治。

筆者的《清代臺灣後山平埔族移民之研究》（由碩士論文改寫）、〈晚清「開山撫番」下奇萊平原地區原住民族群勢力消長

¹² 張世賢，〈晚清治臺政策（同治十三年至光緒二十一年）〉，私立東吳大學中國學術著作獎助委員會叢書之八十（臺北：私立東吳大學中國學術著作獎助委員會，1978）。

¹³ 王慧芬，〈清代臺灣的番界政策〉（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0）。

¹⁴ 李宜憲，〈晚清後山駐兵初探〉，《臺灣風物》，卷50期1（2000），頁13-42；李宜憲，〈晚清後山駐軍與民庄的關聯性〉，《臺灣風物》，卷50期3（2000），頁83-114；李宜憲，〈晚清開撫議論之流變〉，收入《臺灣風物》，卷51期1（2001），頁111-140。

¹⁵ 張永楨，〈清季臺灣後山開發之研究〉（臺中：東海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85）。

之研究〉，對奇萊地區原住民族群在晚清時期的歷史變遷作了分析；¹⁶近年來隨著資料的不斷解讀及翻譯，應該還有深入研析的空間。孟祥瀚的碩士論文〈臺灣東部拓墾與發展（1874-1945）〉，則是從晚清時期跨越到日本統治時期，其對日治時期的著墨比晚清來得多，而對於原住民族群在統治政策下的變遷則比較欠缺，不過他對日治時期東臺灣研究的書目，提供給後來的研究者研究上的便利，可以根據其參考書目進行探究，及進一步的擴展。¹⁷

伊能嘉矩的《臺灣文化志》及《臺灣蕃政志》，在過去一直被視為經典而引用，但他對於「阿棉納納之役」、「加禮宛社之役」……等戰役，很可惜地並未參照當時清帝國官員的奏摺，而以傳說的資料進行分析、探究，¹⁸因此，在利用伊能嘉矩的資料時，務必特別小心。

進入日本帝國統治時期的研究，自日治時期以來即有不少的著作出現，但是直接切入奇萊地區的學術著作則比較少。

關於理蕃政策及相關研究方面，主要有藤崎濟之助《臺灣の蕃族》、鈴木作太郎《臺灣の蕃族研究》、井出季和太《臺灣治績志》、藤井志津枝的博士論文〈日據前期臺灣總督府的理蕃政策〉、藤井志津枝《日本治理臺灣的計策—理蕃》（由其博士論文出版）、藤井志津枝《臺灣原住民史—政策篇》、鍾淑敏〈日據時期的官營移民—以吉野村為例〉、李文良的博士論文〈帝國的山林—日治時期臺灣山林政策史研究〉、蔡迪清的碩士論文〈集

¹⁶ 潘繼道，《清代臺灣後山平埔族移民之研究》（板橋：稻鄉出版社，2001）；潘繼道，〈晚清「開山撫番」下奇萊平原地區原住民族群勢力消長之研究〉，收入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主辦，東臺灣研究會協辦，「國家與東臺灣區域發展史研討會」論文資料，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2001年12月13-14日，頁85-122。

¹⁷ 孟祥瀚，〈臺灣東部拓墾與發展（1874-1945）〉（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88）。

¹⁸ 伊能嘉矩，《臺灣文化志》（東京：刀江書院，1928）；伊能嘉矩，《臺灣蕃政志》（臺灣：古亭書屋發行，祥生出版社出版，1973）。